

广州史志丛书

地方史志与广州 城市发展研究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编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地方史志与广州 城市发展研究

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编



广州新华出版发行集团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史志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
办公室编. —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9

（广州史志丛书）

ISBN 978 - 7 - 5462 - 1652 - 2

I. ①地… II. ①广… III. ①广州市—地方史—研
究—近代 IV. ①K29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3718 号

- 书 名 地方史志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
Difang Shizhi Yu Guangzhou Chengshi Fazhan Yanjiu
-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87 号 9、10 楼 邮政编码：510635
网址：www.gzcbs.com.cn）
- 责任编辑 康 燕 李素娟
- 责任校对 陈洁仪 蒋美秀
- 封面设计 成 智
-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横江 邮政编码：511400）
-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 印 张 22.5
- 字 数 440 千字
-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
-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2 - 1652 - 2
- 定 价 40.00 元

主 编：王林生

副主编：胡巧利

编 辑：刘新峰 张影华

《广州史志丛书》出版说明

当代的地方志工作，是一项具有延续性的长期事业，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编纂一部志书，更需要多方位地开展地情调查、地情研究和地情服务。只有这样，地方志的资政、存史、教化功能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在编纂广州市志的同时，还积极发动修志人员和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地情调查、积累地情资料、开展地情研究、提供地情咨询服务、编写地情丛书、整理旧志、进行方志理论研究等，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志书体例的局限性以及一部市志篇幅的限制，许多地情资料和地情研究成果不能入志。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将有关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广州史志丛书》的形式公开出版，为广州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广州史志丛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 一、有关广州历史情况的旧方志和其他古文献的整理；
- 二、今人有关广州地情的著述、研究成果；
- 三、史志理论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的编审工作由《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负责，并由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实施。

《广州史志丛书》将陆续出版，恳请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内容、形式及编辑出版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广州史志丛书》编审委员会

主 任 杨资元

副主任 王林生 胡巧利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杰 李 杨 杨长明 冷 东

张晓辉 张影华 陈文敏 钟永宁

倪俊明 倪根金 曾 新

“地方史志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 学术研讨会综述

(代序)

自2006年起,在广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指导和资助下,广州市地方志学会先后与广州地方史学会、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联合,以广州城市发展史为主题,每年组织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and 实际工作部门的专家学者广泛参与,积极撰文,使研讨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由广州市社科联、广州市地方志学会与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辛亥革命与广州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46位学者参加了学术研讨,会议收到论文48篇。2012年三家单位又联合举办了“地方志与广州城市史”学术研讨会,40余位学者参会,提交论文40篇。与会学者围绕研讨主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对广州城市发展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研讨内容异彩纷呈,见解独到深刻。为了广泛宣传研究成果,更好地实现研究成果的转化运用,为当前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服务,广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和广州市地方志学会将上述两次研讨会的成果择优结集出版,题名为《地方史志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

在2011年的“辛亥革命与广州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把辛亥革命与广州城市发展历史结合起来研究,多视角、多侧面地考察辛亥革命与广州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开拓了辛亥革命研究的学术视野,同时对广州城市史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在2012年的“地方志与广州城市史”研讨会上,学者们或是探讨广州地方史志的文献价值,或是利用地方史志资料对广州城市史进行广泛研究,在广州城市发展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理论成果。两次研讨会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利用地方志资料研究广州历史,充分发挥地方志的学术研究价值

地方志是最全面、系统、权威的地情文献,是研究一方历史的最基础资料,具有



丰富的学术研究价值。学者们充分发掘地方志资料,研究广州城市发展史,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胡巧利《广州历代方志及其文化价值概述》《广州首轮城市志编修述评》两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自杨孚《异物志》以来的广州地方志,对历代地方志的资料价值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当代两轮新编地方志的特点作了探讨,有助于地方志资料的开发利用。杨恒平《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广东社学的发展》一文,以现存的明清以来广东方志为主要史料,对明清时期广东社学的发展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对社学的规模、校舍、学习内容、学生年龄、教师选聘以及奖惩规定进行了较全面的梳理,探讨了社学对地方教育发展的作用以及后期社学走向衰落的原因。魏雅丽《从广州地方志看番禺学宫建筑历史沿革与变迁》一文,利用《同治番禺县志》和《宣统番禺县续志》所载资料,对番禺学宫沿革兴废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有助于理清番禺学宫的发展历史。陈鸿钧《增城博物馆藏明代抚瑶府司铜印纪略》一文,利用地方志解读文物,并对明清两代对瑶族的治理政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上述研究,既使地方志的价值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又深化了有关课题的研究,为更好地挖掘利用地方志资源作了有益的探索。

二、广泛深入地研讨了孙中山等历史名人和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思想,以及对辛亥革命作出的贡献

与会学者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对孙中山、丘逢甲、陈炯明、高剑父等人物的思想和实践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赵春晨《丘逢甲与广东辛亥革命》,考察和分析了近代杰出志士、教育家、诗人丘逢甲在广东辛亥革命中所作出的贡献,以丰富的史料论证了丘逢甲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暗助革命党人,力促广东和平光复,为革命党人牢牢掌握广东光复后的政权所做的协调工作,并第一个讴歌新生的中华民国。李杨《国际视野下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从学习美国到“以俄为师”》一文,把辛亥革命视为一个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产物,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下考察孙中山的政治思想。文章以大量史料为依据,详细地阐述了孙中山由“以美国共和为立国蓝图”、倾慕民主宪治模式,到“以俄为师”,接受苏俄集权式的“党治模式”的发展变化历程。作者抛开“顺应时代潮流”这样空洞的说法,从美苏对孙中山的态度、国民党内面临的困境、孙中山个人的行事风格等方面,对这一转变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并对“党治模式”的后果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周兴樑《广州三·二九之役实为辛亥首义》一文,从起义的计划、辛亥革命的整体性、黄花岗起义的影响,以及孙中山、黄兴等人对三·二九之役的评价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有力地论证了黄花岗起义的首义之功,进一步深化了对黄花岗起义的历史地位的认识。魏伟新的《浅论陈炯明对辛亥革命和广州城市建设的贡献》,积极呼吁重新评价陈炯明,从加入同盟会、创办《可报》、参加三·二九起义、领导淡水起义等几个方面概括反映了陈炯明在辛亥革命中的主要贡献,又从成立市政厅、市政

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反映了陈炯明对建设广州的重大贡献。关于华侨和留学生对辛亥革命贡献的研究,有3篇文章值得关注。冀满红等的《穗籍华侨黄三德与孙中山的美洲筹款活动》,通过黄三德支持孙中山美洲筹款活动这一个案,从微观层面反映华侨对辛亥革命的支持。黄伟颖《华侨张振勋与近代广州经济建设研究》一文,阐述商业奇才张振勋在广州投资实业,促进广东建材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发展,并对其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冀满红等《略论辛亥革命前的粤籍留日学生》,阐述了粤籍留日学生对辛亥革命的参与和支持。这些研究,深化了对“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一论断的认识。关文明《孙中山的体育思想与实践》一文,对以往较少涉及的孙中山体育思想进行了研究。王发志《辛亥革命前后高剑父的革命活动》一文,较为全面地叙述了高剑父的革命活动,充分肯定了高剑父为辛亥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罗国荣《辛亥革命花县十八烈士与中国同盟会番花分会》一文认为,同盟会番花分会起义队伍的革命力量配备主要是华侨和农民,花县十八烈士的壮举展现出华侨与农民阶级在同盟会番花分会发展乃至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上述成果,既深化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深化了对历史名人的研究。

三、多层次、多侧面研究了辛亥革命给广州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新建立的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实施了一系列新政,从而使这些领域呈现出翻天覆地的新气象。不少学者对有关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给我们呈现了比较清晰的历史面貌。王建生《辛亥革命前后之广东机器行业》一文,梳理出辛亥革命时期广州机器行业发展的脉络。霍秀媚的《岭南近代思想文化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辛亥革命首先爆发于岭南、大部分革命活动发生于岭南的原因,认为岭南地区近现代所产生的先进思想文化深刻影响着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孕育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并最终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生。陈永祥《清末粤剧改良与辛亥革命》一文探讨了粤剧改良与辛亥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通过粤剧改良活动,革命志士逐步将革命宗旨与粤剧内容融合起来,一方面革除了粤剧陋习,另一方面借此联络各地革命组织,传播了革命思想,灌输了民族主义,壮大了革命力量,为广东辛亥革命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李穗梅的《辛亥革命后的广东教育略述》,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运动期间的广东教育,对这段历史转型时期的广东教育发展状况进行系统梳理。罗燕媚的《略论执信中学女国民教育》,则从相对微观的层面,通过对广州市执信中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个案研究,探讨辛亥革命后近代广东女子学校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对社会的影响。胡巧利《辛亥革命时期的广州女子教育》一文,分析了广州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原因及其重要意义,着重对辛亥革命时期广州女子教育的特点进行研究,提出其时广州女



子教育呈现师范教育受到重视、职业教育获得初步发展、思想教育上存在女德教育和革命意识培养的二元性等特点。上述研究,使得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拓展,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出辛亥革命对广州城市发展的深刻影响。

四、对广州建城历史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

对广州建城史的研究,学者们更加着眼于从典型入手进行解剖。吴石坚《五仙观与广州建城史》一文,对五羊传说及五仙观进行研究,并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仅有助于解读最初的广州城建历史,而且对于思考如何发展广州城市文化也有一定的启发。王睿《唐宋蕃坊与胡人聚落》一文,对蕃坊和聚落这两种外侨城居模式进行了研究,对它们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其研究成果有助于认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中的外来因子。吴建新《广东近代治水体系的发端——以〈筹潦汇述〉为中心》一文,以《筹潦汇述》这一民初广东水利史的重要文献为中心,考察以绅商为主的公众参与治水讨论,提出在共和国体制下公民意识高涨和地方自治运动推动了广东近代专业治水机构成立,近代治水体系由此发端。潘刚儿《广州南华西街道历史记忆》一文,对街道内的历史文物建筑进行了研究。街道建筑承载着广州城市发展的文化记忆,街道是城市最基本的细胞单元,街道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一个城市发展变化的缩影。可以说,研究街道建筑是城建史研究趋向更加细致的具体体现之一。杨宏烈、黄谨《广州泮塘古村与荔湾湖公园的景观有机整合》一文,考察了荔湾湖园林发展的历史、泮塘古村的景观遗存,提出将两者有机整合、综合管理,并提出了整合的原则,对于解决当前广州城市建设中的城中村的改造、公园的建设等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上学者的研究,使广州城市史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而其研究视角,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广州城市史提供了许多启示。

五、关于广州外贸和十三行的研究取得新突破

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对外贸易一向发达,尤其是“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独占对外贸易,其影响及于全国乃至世界,因此外贸史、口岸史是广州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讨会上,不少学者撰写了相关论文。黄滨的《明清广州辐射与外港澳、内港佛山的形成》,对明清时期广州城市发展出现的新变局进行研究,提出广州突破单体发展格局,开始寻求内港、外港以及各种类型的卫星城市并为之配伍组团,从此广州迈入一市多体的多核式中心城市组团发展的时代。其研究角度、研究成果都有独到之处,对于今天广州经济圈建设很有启发。金峰《清前期广州口岸中西贸易发展沿革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一文,对清前期由禁海到“一口通商”再到“一口通商”的外贸发展史进行研究,特别探讨了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分析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的影响,这是一个前人很少关注的问题,可以说是对以往研究的补充。白廷兵《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环中国海域大豆贸易圈形成中的作用》

一文,总结出闽粤商人参与大豆贸易的特点,分析了大豆贸易中闽粤商人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外贸史的理论成果。关于十三行的研究也较以往有所进步,有对十三行书信的研究,有对十三行与长崎会所的比较研究,有对行商潘家人才的研究,还有对行商园林海山仙馆的研究。这些研究,或在文献资料上有新的发现,或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对行商个案的研究较以往有所深化。

六、关于广州社会风尚和思想观念的研究论题更加广泛,研究角度较为新颖

辛亥革命是一场社会变革,新的、合乎人性的、合乎科学的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随之诞生,使辛亥革命后的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民国初期广州社会呈现出许多新气象,实际上反映出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是人们追求进步、民主和文明的表现,研究广州城市史,就很有必要关注和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和思想观念问题。曾繁花《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女性分娩的变迁》,以女性分娩为切入点,探究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近代化变迁,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文章认为分娩逐渐走向近代化、科学化,分娩场所、医疗照顾者以及男性医生的介入,这些新因素引起女性身体行为观念的变迁,对女性身心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们的研讨论题还涉及宗教、民间信仰、市民生活等,有些论文的水平也比较高。闫晓青《广州尚存的龙母庙与龙母文化》一文,对天河区猎德村龙母庙的有关文物进行研究,结合有关文献,对龙母信仰的源头、龙母文化的实质以及龙母信仰在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岭南的原始文明和传统文化,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真正了解现实社会,了解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沈晓鸣《海幢寺读音考》一文,通过对读音的分析,揭示当时广州繁荣发达、内外交流频繁的景况,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角度。此外,蔡香玉《不设防的城市——晚清洋人绘制的城市图景》、刘佩《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人眼中的广州市民生活》、张超杰《清代中期的岭南花船与世相》等文选题比较新颖,从新的视角,运用新发现的资料,研究了清末民初广州社会生活,令人耳目一新。

七、从新的视角对广州在全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研究

广州负五岭,临南海,历来是中外交流的门户,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研讨会上,有学者从新的视角对广州的历史地位进行了解读。如冷东、沈晓鸣《中国最早的外国邮局》一文,就英国人在广州开办的英国邮局的设立时间、地点、运作情况及影响进行了探讨,揭示了中国邮政近代化的历程及其特殊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近代化过程中,广州走在全国的前列,起到了引领近代化潮流的作用。曾旅湘《从黄埔古港看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一文,研究了广州海外贸易发展的历程,探讨了黄埔古港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黄埔古港对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认为黄埔港使



广州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使广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文化荟萃之都，并巩固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卢玉华《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国内大城市中发展地位的历史考察》一文，通过纵向比较研究，梳理了广州从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通过横向比较研究，将广州与国内十大城市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对比，探讨了各个历史阶段广州的经济发展在国内各大城市中的相应地位变化。这些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广州在全国的历史地位，也有助于更加科学地规划广州在未来中国城市发展格局中的地位。

八、在史料发掘上取得了一些新成就

史料工作是一项基础工作，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非常重要。蔡维朗《暗杀凤山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一文，对地方志编修工作中掌握的新材料进行释读，并对暗杀凤山事件的重要人物进行了考证。陈志强的《孙中山与广州德国巴陵会教堂》，王建生的《辛亥革命前后之广东机器行业》都在史料方面有所贡献，或是发现了新的史料，或是对原有史料提出考证鉴别意见。这些考证成果，对于还原历史真相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值得肯定的是，在广州城市史领域，学者们的研究方法、学术视野均较以往有所拓展。除了传统的文献论证法之外，还运用比较法、统计法、文献文物互参法等方法进行研究。有的学者还将相关学科理论引入历史学科，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如运用信息论、经济学、文化地理学、文化传播学进行历史研究。从研究选题来看，学者们在关注宏观层面研究的同时，尤其注重通过个案、典型的深入研究去观察广州城市发展的历史。这表明观察问题的视角更加多样，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

当然，不可否认，目前关于地方志与广州城市史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如地方志与广州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的问题，地方志如何才能更好地记述广州城市发展历史的问题，城市史研究如何更好地为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服务的问题，等等，均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些，将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胡乃利

20-三年八月十九日

目 录

“地方史志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代序）	胡巧利（1）
广州三·二九之役实为辛亥首义	周兴樑（1）
丘逢甲与广东辛亥革命	赵春晨（7）
国际视野下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从学习美国到“以俄为师”	李 杨（14）
试论大元帅府时期广州民产保证之推行	
——以《广州民国日报》材料为中心的观察	沈成飞（25）
辛亥革命前后高剑父的革命活动	王发志（34）
浅析黄埔军校的筹备与诞生	曾阳漾（39）
辛亥革命花县十八烈士与中国同盟会番花分会	罗国荣（48）
暗杀凤山中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	蔡维朗（51）
穗籍华侨黄三德与孙中山的美洲筹款活动	冀满红 马孝奇（54）
略论辛亥革命前的粤籍留日学生	冀满红 高 龙（60）
浅论孙科的都市规划思想及实践	胡巧利（68）
试论广州城市规划理念的演变	刘新峰（76）
五仙观与广州建城史	吴石坚（82）
浅论陈炯明对辛亥革命和广州城市建设的贡献	魏伟新（86）
广东近代治水体系的发端	
——以《筹潦汇述》为中心	吴建新（98）
广州泮塘古村与荔湾湖公园的景观有机整合	杨宏烈 黄 谨（107）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国内大城市中发展地位的历史考察	卢玉华（113）



中国最早的外国邮局	冷 东 沈晓鸣 (119)
明清广州辐射与外港澳门、内港佛山的形成	黄 滨 (129)
从黄埔古港看广州海外贸易的发展	曾旅湘 (138)
清前期广州口岸中西贸易发展沿革中的政治、经济因素	金 峰 (145)
明清时期闽粤商人在环中国海域大豆贸易圈形成中的作用	白廷兵 (150)
华侨张振勋与近代广州经济建设研究	黄伟颖 (157)
辛亥革命前后之广东机器行业	王建生 (162)
辛亥革命时期广州工商社团的社会功能	张丽蓉 (170)
岭南近代思想文化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霍秀媚 (178)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州女子教育	胡巧利 (184)
略论执信中学“女国民”教育	罗燕媚 (191)
辛亥革命后的广东教育略述	李穗梅 (197)
从地方志看明清时期广东社学的发展	杨恒平 (209)
从广州地方志看番禺学宫建筑历史沿革与变迁	魏雅丽 (214)
清末粤剧改良与辛亥革命	陈永祥 (222)
《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文化特性考察	田 果 (227)
孙中山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关文明 (234)
广州历代方志及其文化价值概述	胡巧利 (238)
广州首轮城市志编修述评	胡巧利 (244)
唐宋蕃坊与胡人聚落	
——以广州和长安为例	王 睿 (251)
不设防的广州城	
——晚清洋人绘制的城市图景	蔡香玉 (259)
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人眼中的广州市民生活	刘 佩 (273)
清代中期的岭南花船与世相	张超杰 (281)
辛亥革命前后广州女性分娩的变迁	曾繁花 (287)
广州尚存的龙母庙与龙母文化	闫晓青 (296)

海幢寺读音考	沈晓鸣 (304)
孙中山与广州德国巴陵会教堂	陈志强 (317)
增城博物馆藏明代抚瑶府司铜印纪略 ——利用地方志解读馆藏文物之一例	陈鸿钧 (320)
广州大学城金银山明墓小考	王 强 (323)
广州南华西街道历史记忆	潘刚儿 (328)
浅析广州历史地名文化	曾 新 曾宪珊 (338)
后 记	(344)

广州三·二九之役实为辛亥首义

中山大学 周兴樑

【提要】关于辛亥首义的问题，有人认为是四川保路运动中的荣县起义和独立，更多的人主张该是武昌起义，而笔者则指出：无论是从起义的先后时序来说，还是就其历史联系与影响而言，抑或以孙中山和黄兴之有关论说为证，广州三·二九起义都堪称为辛亥首义。

【关键词】三·二九起义 武昌起义 辛亥首义

1911年（辛亥年）先后爆发的几次武装起义，最终导致了清王朝垮台。关于这些起义——尤其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广州三·二九起义（又称黄花岗之役）和武昌起义两者，谁才是辛亥首义？学界之同人对此见仁见智。

众所周知，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同盟会党人曾先后发动过20多次大小起义，其中的辛亥广州之役（广州三·二九起义）和武昌起义，是最受孙中山和后来民国共和政府重视的两次大起义。这可从孙生前曾多次论及广州三·二九之役和武昌起义，以及它们皆有法定的纪念日两方面看出来。孙中山及其革命政府从1912年（民国元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始，曾多次悼祭缅怀前次起义的72名烈士，他本人还在1924年7月发布大元帅令，规定以后每年的阳历3月29日为黄花岗起义纪念日。而对于后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早在1912年9月28日，就议决以每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日）为民国的国庆节。关于辛亥首义的问题有几种说法：不少的史家皆称武昌起义是辛亥首义，或通用“武昌首义”之说；也有人指出，由党人王天杰、吴玉章等领导的，比武昌起义要早一些的四川荣县起义（1911年9月初）和荣县独立（1911年9月25日），应是“首义实先天下”。而笔者则在10年前曾提出并且现在仍认为：广州三·二九起义（即黄花岗之役）是辛亥首义。笔者当时只提出了这一看法，并未详述其所以然，下面拟就所持观点之理由和依据作些补述。

一、广州三·二九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次起义

笔者认为，说广州三·二九起义是辛亥首义，与辛亥年几次反清武装起义的发展



史实相符合。“首”字用作量词时，有第一、最早、头先等义，故辛亥首义指的应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次起义，这应是黄花岗之役。此次起义就其计划来看，是一次以广州为突破口的全国性大起义。据胡汉民后来忆述称，为保证这次全国性大举的计划能够顺利实现，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讨论起义的会上决定：辛亥广州起义之筹划“分为两种任务：一统筹部分科（课）办事；一长江上下游谋发动援应，陈英士（其美）、宋教仁（教仁）、谭石屏（人凤）、居觉生（正）等，皆受约束而行”^①。据此，统筹部乃下设8课分头办事：其中的交通课主要是负责完成第二项任务——联络他省特别是两湖地区之军队与会党届时举兵响应广州起义；而其他的7课则负责黄花岗起义本身之各项筹划发动工作。就这样，定广州为中心起义区，以长江流域之两湖等地为策应之师的全国性大起义计划，开始进入了筹划策动阶段。

在此过程中，黄兴和统筹部积极采取措施多渠道地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市和广西等地届时举兵响应。黄在统筹部成立后不久，就派时在香港的谭人凤为特派员，并给予“二千金”活动费，命其奔走于上海、南京、九江、武汉、长沙等地，负责联络发动长江中下游各省尤其是地处要冲之两湖地区到时举兵援应。他在谭衔命北上后，又托人带密函给已由东京返汉的居正说：“吾党举事，须先取得海岸交通线，以供输入武器之便。现……广州大有可为，不久发动，望兄在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②。同时，黄兴又命在沪的陈其美、宋教仁等来港赞助一切。他还派郑赞臣在沪设立机关，负责联络发动江、浙、皖等省志士到时援应起义，并要方君瑛赴桂林活动，策动广西之新军响应广州起义。

不久后，谭人凤的鄂、湘之行就取得了巨大成绩。他于2月23日到汉口后，即约同盟会会员、共进会的负责人居正及孙武等聚商于旅馆中，并对他们说：“余奉黄（兴）先生命，督率长江革命之进行。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因黄先生与胡展堂、赵伯先诸兄均在香港，各省同志毕集，决在广州起事，谋既定，款亦有着，最短时间当能实现，两湖宜急起响应。”^③当孙武提出在武汉发难有革命党人已在新军中打下了良好基础、汉口有兵工厂可生产武器、武汉地处水陆交通中心、军民的反清情绪高涨等四大优越条件时，谭不赞同他在武汉起义的主张，仍坚持统筹部关于广州发难、湖北响应的方略。彼此商谈过后，谭即从所带的2000元款中拿出600元给居正、200元给孙武，作为共进会接下来开展活动的费用。^④在汉期间，谭人凤还从詹大悲口中得知武汉新军中有不久前成立的实力团体文学社，于是即约其主要领导人蒋翊武等见面，从而与文学社建立了联系。他的这次武汉之行，促使该地区之革命运动为响应广州起义，而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①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6页。

② 《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页。

③ 《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④ 谭人凤：《石叻碑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页。